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一次创新性实践。这一制度旨在充分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以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现代化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它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相结合。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路径,着重考察中国在实践中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原则。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

#### (一) 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演进可以追溯到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积极适应了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需求,这体现在以下方面: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拒绝市场经济,而是通过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计划相结合,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创新性举措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成功融合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价值观。

特殊经济区域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特殊经济区域,如深圳经济特区,以吸引外国投资和技术,并推动经济改革。这些地区的成功实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全国范围内的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发展外贸等一系列举措。这些政策的实施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化融合,将中国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通过上述创新性举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路径探讨

■ 牛天歌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 (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础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渊源。中国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引入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基础。随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事件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领导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斗争中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不断适应新的历史挑战。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产生了动荡,但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进行了自我批评和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路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断发展和适应的产物。这一历史渊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能力也确保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持续传承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适应与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渊源,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全球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过程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的融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成功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原则,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进行了现代化建设。以下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分为文化融合和现代化建设。

#### (一) 文化融合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的影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中国传统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价值观、社会和谐、忠诚和孝道,这些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原则融合,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有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感的增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包括爱国主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团结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得到强化,以更好地满足中国社会的需求,促进社会和谐。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进行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以挖掘传统文化的智慧,将其与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实现更好的治理和社会管理。这一融合带来了更加包容和灵活的社会政策,同时强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认同。

(二)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推动现代化建设,体现在以下方面:

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变,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这不仅提高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还为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村改革与城乡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通过农村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缩小了城乡差距。这不仅有助于社会稳定,还为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机会。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致力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情况。这不仅有助于改善国内环境质量,还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积极贡献。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融合和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充分借鉴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的智慧,同时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实现了独特的现代化道路。这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具有广泛的影响与作用。以下是关于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作用的更详细阐述:

#### (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全球合作,促进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发展。通过投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出口和投资,还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精神,促使不同国

## “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双重逻辑

■ 黄婷婷

“两个结合”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智慧结晶,极大地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涵和途径,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和文化传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着深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

### 一、“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理论逻辑

#### (一) 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需要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教条,而是需要在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灵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根据不同的现实境遇灵活运用,现实境况不同,运用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经验,对“两个结合”的发展形成存在一定的理论逻辑。

“第一个结合”的观点正是对马恩思想经验的汲取和拓展,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之,将马克思主义与各阶段的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结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 (二)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高度契合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源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但是从理论特征、精神气质和价值观念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存在高度契合。首先,从这两者理论特征来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来都展现出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特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化精华,丰富和发展自身。同样,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始终关注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理论的有益成果,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完善,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其次,从这两者的精神气质来看。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具有相似之处。对于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阴阳相生”“祸福相依”等理念,体现了对事物相互转化和变化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两者都承认事物的动态性和变化性。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都重视实践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知行合一”,认为知识和行动应当相互结合、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则将实践视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途径,认为实践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从这两者的价值观念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愿景,描绘了一个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社会愿景。马克思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社会,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和人类自立而全面发展。

#### 二、“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实践逻辑

##### (一) 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要让马克思主义这棵真理之树在中国固枝荣,必须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核心要素,蕴含着思想观念、政治观点、

道德规范、人文精神、哲学思维等,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还能激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发挥着重要的时代价值。积极挖掘和阐发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充分吸收其中蕴含的治国理政的思想智慧、格物穷理的思想方法、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融合,筑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具有影响力和感召力,更好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 (二) 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团结和带领全民族推进“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谋富强、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民群众谋幸福。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六个必须坚持”,第一个“必须坚持”是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意味着“两个结合”要从人民需求出发,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形成人民群众所能认可和践行的理论。纵观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作为贯穿“两个结合”的重要主线,人民群众既是“两个结合”的力量源泉,也是“两个结合”的受益者。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群众始终处于“两个结合”过程中的核心地位,也“为两个结合”指明根本的发展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是推进“两个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能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还能使“两个结合”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激发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

##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困境与机制创新研究

■ 魏嘉锐

近年来,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引起了广泛关注。2024年我国人口总量连续第三年负增长,总和生育率徘徊在1.0低位。当前,低生育率的现象已不再单纯由死亡率主导,而是更多地受到了功利性生育意愿下降和生育成本制约的影响。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破解“不愿生、不敢生”的深层困境,以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 一、生育率下滑归因多元

近年来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越高,结婚率与生育率越低,因此应该提高女性接受高质量高水平教育的门槛。首先,这种观点不符合我国实行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其次,这种观点十分片面。不可否认,我国的低结婚率、低生育率与逐步提高的女性受高教育水平教育比例相关,但致使我国总和结婚率和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女性教育的不断深入,女性意识逐步觉醒,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在此背景下,诸多女性不愿因生育而囿于家庭,致使自身社会价值难以充分实现,进而导致生育意愿降低。

当然,生育并不是女性单方面决定的,生育率低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上承受的生存压力有关,例如,养育成本高昂和房价飙升的经济因素、职场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社会因素。2021年我国正式出台了“三孩生育政策”,各地积极完善生育支持体系,通过一系列配套措施,如生育及育儿补贴、生育保险福利、育儿假期延长等,旨在减轻家庭在生育、养育及教育方面的经济负担。然而,当前的支持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强,同时各项政策的落实情况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在经济学概念中,理性经济人完全依照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行动和决策。假设女性是理性人,那么身处并不完善的生育休假和生育补贴制度之中,女性难以做出生育的决策。

另一种片面的观点,简单地把人口出生率下降归结为我国曾经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我国人口过度膨胀、推动经济发展及社会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力地减轻了人口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影响,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铺设了良好

的基石。然而,若仅将当前人口出生率的下滑简单归结于这一政策,则忽略了背后更为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演变以及人口结构深层次调整的多重因素。

#### 二、赋权于民与赋予生育价值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生育友好型社会,本质上是指在一个社会环境中育龄女性能够在充分理性思考的基础上,主动认知并积极响应国家制定的生育政策,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风尚。在这种情况下,生育的尊严和价值将被广泛认可,生育权益和生态环境将得到坚决的保护。

在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进程中,首要之举在于“赋权于民”,确保生育权利真正回归到每个家庭,这是激发当代适龄女性尊重并珍视生育社会价值的重要前提。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每位女性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有些女性坚持不婚不育以追求自身的独立和男女平权,我们尊重她们对自己选择的权利,但女性没必要因为要实现追求某项权利而以牺牲另一项权利(生育权)为代价。“赋权于民”实现的核心在于让生育决策回归家庭内部,由夫妻双方共同商定孩子的诞生时机与数量,强调生育权回归家庭,并非意图削弱党和国家在人口战略规划中的引领作用,而是倡导不再依赖法律或行政的强制性措施来约束个人的生育抉择。这要求将重心转移至优化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通过正面引导和合理调节,帮助造龄女性及家庭清除生育决策过程中的障碍,从而确保生育行为基于自主意愿与自由选择。

#### 三、生育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生育友好型社会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利益的必然选择,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口安全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年龄,还有助于积极应对我国目前面临人口的老龄化挑战,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间的显著差距。

#### 三、生育的情绪价值

当前,我们常常过于看重工具理性层面生育行为所带来的利弊,其实生育还涉及更多精神层面的价值。情绪价值,即他人的语言、行为等对某个个体情绪的唤醒,这种情绪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生育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自古以来就承载着延续生命、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生育始终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古代的多子多福观念,到现代的优生优育理念,生育始终被视为一种神圣而伟大的行为。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生育观念,使得人类社会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

“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体现了情绪价值的重要性。这种观念源于对家庭、亲情和未来的深切期望,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考量,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寄托和保障。从情绪价值的角度来看,“养儿防老”意味着在晚年生活中,子女的存在本身能够成为父母的精神支柱和情感慰藉。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会面临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交圈子的缩小以及生活节奏的变化等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的陪伴、关心和照顾对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至关重要。子女的存在不仅可以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亲情的力量,还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晚年生活,减轻孤独感和无助感。此外,“养儿防老”也体现了父母对子女成长和未来的期望。父母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情感。他们希望子女能够健康成长,成为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当子女在成年后能够回馈家庭,照顾年迈的父母时,这不仅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对他们情感投入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和认可对于父母的情绪价值来说,是无比珍贵的。

####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生育友好型社会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利益的必然选择,是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人口安全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能够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年龄,还有助于积极应对我国目前面临人口的老龄化挑战,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与演进

■ 王康标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生成,体现了马克思对所处时代实践和理论剧烈变革的深刻洞见,其演进轨迹伴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深化发展。准确把握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语境与演进轨迹,对于推进五种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 一、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语境

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出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状态的精准把握,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勃兴的现实境遇和理论考察从流域转向生产领域的转换。

##### (一) 机器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8世纪中叶,已经摆脱了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英国资产阶级率先发起并完成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的产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工具的深刻变革和巨大的技术进步,建立起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生产系统。产业革命的历史性突破与机器化大生产的全面确立,不仅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臻固和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兴阶级的逐步形成,更深刻地重构了资本家和工人的对抗性本质关系。“局部工人”转型为“总体工人”,劳动者不仅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任何形式控制,更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过程中沦为“机器的附属性物”,表现为工人必须严格遵循机器体系的机械节奏,劳动内容被降格为“纯粹抽象的机械运动”。自动化的机器生产体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强化了对剩余价值榨取,并在技术革命的表象下实现了相对剩余价值的隐蔽剥削。此外,资本通过将妇女儿童纳入雇佣劳动体系,不仅瓦解了前资本主义的家庭生产单位,更实现了对劳动力价值的双重掠夺,一方面,家庭内部的无酬家务劳动被整合进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童工的普及使工人家庭陷入“代际贫困循环的深渊”。

##### (二) 古典政治经济学考察从流通转向生产

从17世纪中叶起,相继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逐步取代封建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逐渐取代此前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商业资本而居于统治地位。社会经济基础的变更引起了理论的变更。作为产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表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将理论视野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考察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威廉·配第首先将理论关注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他指出:“假定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栽种谷物……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获之中,扣除了自己的种子,并扣除了自己食用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予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这块土地一年的自然的真正的地租。”此外,法国重农学派也将目光从流通转向生产,认为物质产品,使用价值来源于农业生产。亚当·斯密对剩余价值形式的考察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利润范畴,并将利润和地租视为剩余价值的基本形式。古典经济学家虽然都没有明确提出剩余价值这一范畴,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但是他们将理论关注投向生产,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形成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基础。

#### 二、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演进轨迹

《莱茵报》时期的物质利益困惑,引导着马克思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深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实现了生产理论的阐发奠定理论基础。最后,超越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全面生产”成为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紧接着,满足需要的同时又会生产新的需要,二者在时间上是继起,在空间上并存。在详尽考察上述三种生产之后,他们接着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出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出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由此可见,在一定的“交往形式”中存在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也存在人与人之间结成的历史的交往关系。

##### (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资本论》中的深化拓展

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通过对斯密“生产劳动”范式的批判、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改造和对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实现了从“物质生产”到“全面生产”的范式跃迁。马克思批判斯密的“生产劳动”范畴,突破了将劳动局限于物质财富创造的狭隘定义,揭示了生产不仅改造自然对象,也改造社会关系和生产者自身。其次,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进行唯物主义改造,将“对象化劳动”从观念辩证法中解放,确证“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从而为全面生产理论的阐发奠定了理论基础。最后,超越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生产的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使“全面生产”从价值论上升为科学范畴,从而构成“生产—再生产—总体”的辩证运动体系。此外,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关系生产的异化状态,论述